

主编 寇艾伦 (Allen Carlson)  
高敏 (Mary E. Gallagher)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墨宁 (Melanie Manion)

#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许安结 赵明昊 张勇 等译  
段若石 胡国成 赵梅 审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寇艾伦等主编,  
许安结等译,段若石等审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161-4855-6

I. ①当… II. ①寇…②许…③段… III. ①政治-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D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2579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夏侠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李建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327千字  
定价 58.00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 寇艾伦(Allen Carlson):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陈 鹏(Calvin Chen):美国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政治学副教授  
曦 中(Xi Chen):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狄忠浦(Bruce J. Dickson):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段 宏(Hong Duan):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博士候选人。  
高 敏(Mary E. Gallagher):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葛小伟(Peter Hays Gries):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问题研究所主任、副教授,哈罗德·J.和卢斯·纽曼美中问题讲席  
贺 斌(William Hurst):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助理教授  
李 磊(Pierre F. Landry):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全球经济发展资深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刘明兴(Mingxing Liu):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  
墨 宁(Melanie Manion):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与公共事务教授  
芮杰明(Benjamin L. Read):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单 伟(Wei Shan):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  
沈明明(Mingming Shen):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而在这方面，民族志恰恰能提供一种其他途径无法提供的新颖视角和重要的见识。

为了掌握个人和群体赋予他们的行为、实践活动和生活圈子的不同含义，中国研究这个领域已做好准备。它不仅要重新检验和修正那些支撑现有理论的各种假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重新评估那些已被认可的、涉及特定结果产生原因和产生方式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重新唤起人们去丰富和深化自己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来自于缜密考察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把“中国政治不同寻常的多样经历”<sup>①</sup>融入学术讨论中，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交流和发展。

(陈文佳译 段若石校)

## 第七章

### 访谈与民族志之间

——用深入实地方法研究精妙和隐形的政治

芮杰明 (Benjamin L. Read)

在过去的20几年里，汉学领域从运用民族志和参与观察方法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中获益匪浅<sup>①</sup>。人类学家在这方面一马当先，发挥了表率作用<sup>②</sup>。一些社会学家对这些方法也是乐此不疲<sup>③</sup>。不论它的学科起源如何，也不管研究的特定主题是人际关系，乡村治理还是农民企业家，很多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读罢这些书籍之后，人们自然而然会获得大量的关于中国权力运作的宝贵知识，尤其是发生在基层组织层面的事情。

一些政治科学家也使用类似于这些研究手段的方法来研究中国<sup>④</sup>，可在这些方法与政治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中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虽然在我们的领域中一些人早已经使用民族志和参与观察方法（在下面我将这两种方法归在“深入实地方法”类别之下），然而这些方法总被人看做是左

<sup>①</sup> 更不用说费孝通、西德尼·甘博 (Sidney Gamble) 和其他人以前的作品成果。而且，本章说到的仅仅是使用英语出版的研究。

<sup>②</sup> Bruun, 1993; Chen, 2003; Fong, 2004; Friedman, 2006; Gladney, 1996; Hertz, 1998; Jacka, 2004; Jankowiak, 1993; Jing, 1996; Judd, 1994; Kipnis, 1997; Litzinger, 2000; Liu, 2000; Murphy, 2002; Notar, 2006; Perkins, 2002; Pun, 2005; Rofel, 1999; Schein, 2000; Watson and Watson, 2004; Yan, 1996, 2003; Yang, 1994; Zhang 2001.

<sup>③</sup> Calhoun, 1994; Chan, Madsen and Unger, 1992, 2009; Farrer, 2002; Lee, 1998. 我要感谢伊利莎白·J·佩里 (Elizabeth J. Perry)、张莉 (Li Zhang) 和麦宜生 (Ethan Michelson) 提醒了我注意在这里提到的一些内容。

<sup>④</sup> 除了下面将要讨论的研究，还可参见 Blecher and Shue, 1996;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2005; Hurst, 2009; Steinfeld, 1998; K. Tsai, 2002, 2007.

<sup>①</sup> Perry, 1994b, p. 712.

道旁门。目前人们仍旧就何为本学科的重要知识以及获得这些知识的实用方法莫衷一是。其他定性方法的使用者不久前也加入了这场论辩。他们明确地阐释了其工作是如何与创立和检验政治科学理论的进程相结合。使用民族志和参与观察方法的新生代最近也颇为活跃<sup>①</sup>。沙茨(Schatz)发现,这个群体的成员之间也不尽相同。自诩为阐释主义者的人向政治科学主流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多种观点发起挑战。他在书中写到,其他人以一种有限度的新实证主义者的模式在做民族志的工作。他们“细致入微、全神贯注于创建中层理论,认为积累知识是一种值得追寻的方向,对于学者做出贡献的潜力抱乐观的态度”<sup>②</sup>。虽然我赞成应从多视角研究政治的看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科学范式,但是我所要讲的属于第二种类别。我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科学家能够而且也应该认识到正在讨论中的实地考察手段的价值。

本章引用了中国研究以及其他地区研究的样例,其大部分内容与特定国家无关。我在这里提出一种观点,即深入实地方法对于中国研究是一种尤为恰当且必要的方法,这个观点也适用于其他非西方国家环境和受到政治压制的环境。我希望这个倡议能够得到响应,使运用民族志和相关手段的研究者携手共进,而不是像过去有些人那样互相拆台。这就意味着要更加深入了解研究其他地区的专家的工作。

依据目前的研究情况,我所倡导的政治科学民族志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我们这些实践者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我们在实地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撰写和总结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因观点相同而团结一致,用它指导我们的行动,提高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效率。第二方面更具有普遍性且关系到本学科。在某种程度上,若要深入实地方法在政治科学中有所成就,必须下大力气重塑学科本身,必须让其他政治科学家明白这些方法是如何适用于他们所熟悉的方法论领域的。只有这样,这种类型的研究,不论是关于中国的还是关于其他地区的,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本章特别关注实地研究方法的内在权衡问题,尤其是研究广度(研究更多的单位,尽量发现更多的差异)和深度(有效性、丰富性和对每

<sup>①</sup> Schatz, 2009b.

<sup>②</sup> Schatz, 2009a, p. 14.

个单位的深入了解)之间的权衡。政治科学家有责任面对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面临的同样问题。同行们希望我们能运用理论术语概括问题,解释差异性。而有时最恰当的研究方法就位于研究范畴的这一端或是另一端,因此要能够养成对某个实地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的习惯,正如詹姆斯·斯科特<sup>①</sup>在他称为“塞达卡”(Sedaka)的马来西亚村庄中所做的著名研究;或是像在许多调查研究中一样,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采访来收集相对有限的信息。虽然用民族志的传统方法可以达到某种深度,然而有时候多种原因要求使用折中的方法,在观察的深度上做一些让步。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干净利落地解决此种困境,但是本章仍将努力概括总结这些因素,并加以解释。

最后,我也恰好是一位支持用多种方法或“混合方法”攻克政治科学的实证问题的坚定分子。在我自己做的关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街道组织的研究中,我将从参与观察和访谈得到的深刻理解与宽泛的调查数据结合起来。本章以下探讨的其他研究也使用了多重方法,也体现出开发多种类型信息的益处。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的方法自身需要被政治学者理解和阐明,而不是在它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使用时才被理解和阐明。

## 第一节 深入实地法

以民族志和参与观察为名的方法在政治科学中的地位有些令人尴尬<sup>②</sup>。我们这个学科自以为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取得了许多丰硕的学术成果,这听起来有些孤芳自赏的味道,其中两部最流行的作品是芬诺(Fenno)的《家常风格》(*Home Style*, 1978)和斯科特(Scott)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1985)。实证研究者中的一部分人被这些方法所吸引,最早要回溯到二战刚结束时期,或者是更早的一代人<sup>③</sup>。他们偶尔在小组会议中讨论这些方法。现在人们已将这些方法或单独或与其他方法结合的方式,积极地应用于一些更吸引人的

<sup>①</sup> Scott, 1985.

<sup>②</sup> Bayard de Volo and Schatz, 2004.

<sup>③</sup> Banfield, 1958.

研究中<sup>①</sup>。

然而, 这些方法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公平地讲, 它们只是在方法论的课程里才被偶然提到。即便是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内倡导定性和混合方法的正规部门里, 以及近些年营造起来的热烈氛围中, 这些方法仍被看做是“远房亲戚”。比如在定性研究方法研究所的2006年课程大纲中几乎对它只字未提。近期出版了一些关于定性方法的最重要的图书, 其中两本虽然对民族志学者和参与观察者而言相当实用, 但是都没有专门提到这些方法<sup>②</sup>。

为什么它们会受到如此冷遇? 我首先要讲一些最简单的原因, 那就是掌握运用这些方法的技能并把它们应用于实际,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资金, 尤其当研究是在不同语言环境下进行的时候。所以向那些急于压缩时间完成学业的普通研究生推荐这些方法时, 往往好心得不到好报。况且, 在整体学科中, 人们还需要掌握其他更多的方法和技能。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由于认识不同, 实践者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例如上文提到的“阐释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分歧, 在近期的作品中越来越明显<sup>③</sup>。有一部分人在文章中除了描述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 不太愿意向其他人介绍自己采用的方法。在政治科学中, 尽管这些方法有助于创立和检验理论, 但是还没有充分地向人们说明它的益处, 最后, 也许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人们还没有认真地把民族志和参与观察方法中关键的评估、应用以及教学结合在一起使用。

我相信, 对于使用这些方法的研究者来说, 不论他们是只使用这些方法还是兼用其他方法, 在学科内共同努力建设一个联盟或使用群体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步骤。这项工作首先应当在搜集信息来源、证据和数据的相关方法方面达成共识。我们希望这样做可以超越和消除认识方面的分歧。

也许我们应当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系列相关方法。这样的术语就是深入实地法 (SIMS), 它指的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收集证据。在这种情

① 与中国无关的例子包括: Adams, 2003; Allina-Pisano, 2004; Bayard de Volo, 2001; Cammett, 2005, 2007; Galvan, 2004; MacLean, 2004, 2010; Roitman, 2004; Schatz, 2004; Straus, 2006。

② George and Bennett, 2004; Brady and Collier, 2004。

③ Burawoy, 1998; Schatz, 2006; Yanow, 2003。

境下, 人们与环境互动, 使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更加贴近所要研究的问题, 这意味着与电话调查或某些形式的一次性访谈相比<sup>①</sup>, 它需要更加深入现场、环境、地方, 与各种信息提供者有更深的接触。这个术语包含所谓“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的主要含义, 也许还包括其他一些做法, 比如焦点小组。它还强调这种研究采用的不同形式, 比如在一个地点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者是着眼于广度的研究, 以及以深入实地法为主要方法或以它为辅助方法的研究。

说实话, 我提出像深入实地法那样的新术语实属无奈,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还不太相信其他方法能够在政治科学中把研究者有效地联合起来。“民族志”在社会科学卷帙浩繁的方法论研究中, 尤其是人类学中, 具有长期的优势, 但它也并非完美无瑕。一些人类学模型把标准设得过高, 迫使人们需要长年累月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这可能意味着一种整体主义的倾向, 即必须了解某一个社区或地点的整体情况, 才能理解其中某个部分。还应指出, 目前民族志的含义和实践正经历着变革和激烈的辩论, 并不是所有的实践者都认为民族志应局限于这些形式<sup>②</sup>。虽然如此, 在我看来, 这个术语还是不太适用于短期实地考察和信息搜集覆盖面窄的研究项目。

而且, “参与观察”是一个太笼统的术语。这个概念在这里所指的界限可能与我们想要放在一起谈的问题并不完全吻合。一方面, 研究者“参与”其他类型的研究, 例如纯粹的访谈。另一方面, 对某些人而言, “参与观察”则意味着只有经过一段长期的过程, 研究者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才能算是完整和真正的参与。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参与观察”只涉及民族志所指的实践活动的某一部分,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两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

正如本章上文提到的, 在政治科学的深入实地方法研究中, 人们阅读得最多的两部书就是芬诺<sup>③</sup>和斯科特<sup>④</sup>的。对这些书籍进行深入思考可以让我们想想怎么做才能在学科中整合和提高这两种类型的研究。从一个角度看, 它们具有巨大的差异, 也许在方法上几近两个极端。斯科特把他的

① 其实一些类型的调研和访谈需要大量的铺垫和建立信任的工作, 见 Posner, 2004。

② 如马库斯 (Marcus, 1998) 有所保留提出了某些观点支持多实地研究。

③ Fenno, 1978。

④ Scott, 1985。

研究工作说成是：在一个拥有 360 位居民，化名为塞达卡的马来西亚村庄中进行的“一种深入实地的、细致入微的研究阶级关系的工作”<sup>①</sup>。斯科特将他的方法定位于人类学民族志的传统做法<sup>②</sup>，他说，他在塞达卡度过了至少 14 个月来进行访问、观察和参与村民生活。

而芬诺<sup>③</sup>完成的作品，则着眼于政客和选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当选代表如何看待他（她）的选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另一个问题：他（她）的看法对其行为产生何种影响？”<sup>④</sup>他采用的方法是在美国众议院议员所居住的地区内和他们朝夕相处。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戏称为，“没完地和他们泡在一起，四处打探，或者只是随便逛逛”，就我所知，他把自己的方法明确地定位于社会学家和其他政治科学家所使用的参与观察的传统方法，而对民族志却只字未提<sup>⑤</sup>。在这本书以及长长的方法论附录中，芬诺以一种直白甚至自我调侃的方式解释了他采用的方法：跟着政客到任何他们允许跟着的地方，和他们套近乎并记下他们讲的话，见机行事提出问题<sup>⑥</sup>。显然这比斯科特的村庄研究在参与研究的程度上要“薄弱”得多。与单一实地项目相比，芬诺牺牲了深度来换取广度，他研究了 18 个不同的代表，在他们的党派和资历等方面发现了巨大的差异<sup>⑦</sup>。他在每一位代表身上花费的时间从 3 到 11 个工作日不等，平均达到 6 天<sup>⑧</sup>，而在其中某些天里，他接触研究对象的时间非常有限<sup>⑨</sup>。

尽管它们的区别很大，但可以把这两本书简单地归为一类。两位学者在这一领域中都坚持自己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一方面有其主导性和臆测性，而另一方面又具备理论代表性。两位学者在研究中都确立了一个实证研究的主题，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而那些假设都是需要

① Scott, 1985, p. 41.

② Scott, 1985, pp. xviii, 46.

③ Fenno, 1978.

④ Fenno, 1978, p. xiii.

⑤ Fenno, 1978, pp. xiv, 249, 295.

⑥ 他还在 1986 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文章和其他文章中讨论过他的方法，全部文章重新收录在芬诺（Fenno, 1990）的作品中。

⑦ Fenno, 1978, pp. 253-254.

⑧ Fenno, 1978, pp. xiv, 256.

⑨ 人们可以继续对比。当然斯科特特别关注的是底层的声音和经历，而芬诺则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他研究的精英令人赞许的同情。

通过实地研究来检验和充实的。

## 第二节 研究者何时需要使用深入实地方法

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方法对于政治学研究特别有价值，甚至有时候是必需的呢？有一种情况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方法的特殊价值，那就是当我们研究的内容极其微妙时（例如，关系、网络、身份、风格、信仰或行为模式）<sup>①</sup>，当我们的研究内容是不公开的、敏感的，或者需要建立信任才能打破僵局，需要等待时机，打开路子才能看到真实情况的时候<sup>②</sup>。斯科特和芬诺的研究是这方面的范例。简而言之，在两本书中，他们研究的基本主题都是个体的观念（农民如何看待阶级关系和政客如何看待他们的选区）。而观念往往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因此调查和简短访谈这样的研究形式在这里行不通，需要采取建立信任和长期观察的策略。

微妙性在这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充分运用深入实地法解决问题的途径会随着现有理论发生巨大变化。斯科特采用他自己设计的方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靠的是他的读者接受了他的观点，把臆测作为一种成立的解释，否则他将一事无成。怎样具体地运用深入实地法才合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现有假设和数据的精细严谨。如果大家都承认在 X1、X2 和 X3 固定的情况下，X4 与 Y 有正相关关系，而且承认争论的问题关系到系数的大小，而无论它们的关系是线性的还是二次的，是否需要加入与 X5 的交互，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仅仅观察到 X4 和 Y 有相关关系，那么是不足以对以前的研究提供什么附加价值的。深入实地法并不仅仅适用于研究少数题目或现有理论尚不成熟的情况，它还能够有效地指出，X4 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以至于需要新的测量方法，或者在实际生活中，因果关系看起来从 Y 直接到 X4，它们的关系还受到以前完全被忽略的其他因素的制约。

那么这种方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否特别适用呢，答案是“肯定的”。那种强调中国的社会政治现象比其他地方更“微妙”的说法是无稽

① 实际上，在政治学领域内我可以想到的大多数概念都包含微妙成分，需要对它们仔细观察。我们这样说这并不是要否认非深入方法对这些研究主题的作用。

② 关于政治的不公开面，参见 Scott, 1990; Kuran, 1995。

之谈。然而可能有人会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发生的事件和现象,至少在初期会扰乱北美和西欧创建的社会科学,使它们难以捉摸。这些现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文化大革命”,地方协会、利益代表方式,争端模式和对不满的表达,在中共领导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过渡,甚至是中国现政权的类型。像“我在中国看到的现象属于何种情况?”<sup>①</sup>这样的问题有时难以回答。它虽然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是也为创新提供了机遇。因此,正如其他非西方制度下的研究那样,在确定中国实证现象与现有概念的关系之前,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仔细分析,而深入实地方法非常适用于这个目的。

这个答案的另一部分关系到“不公开”研究对象。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即使是在开放自由的政治体制下,某些重要的问题也是不公开的,比如政治家对他(她)的选区的真实想法。在中国,国家管制使人们有时很难获得数据,而且会担心那些数据的有效性。今天的中国大陆既不像中国台湾等地区那样开放,也不像朝鲜或缅甸那样闭塞。人们能接触到什么样的机构或个人因情况而异。有时候,人们只需从正门走进一个政府机构就能获得需要的信息。对于一般性问题,即使作为陌生人,打一通电话或者做一份问卷调查已经足够。官方的阻碍和非官方信息的漏洞百出是最常见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虽然人们无法通过一次访问或谈话获得有效或有用的详细信息,但是可以采用一种更具耐心的方式获得。与那些具有更加开放的政治机构和更高透明度、公开度的国家相比,在中国的很多情境下,需要有更精心的策划才能获得有用信息。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封闭或半封闭的政治体制内,通过建立信任和耐心进行信息收集,还是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的。

正因为如此,一些类型的项目需要在研究地点进行深入的挖掘,比如对人类行为进行直接观察,尽管这些类型的研究也许并不属于民族志的传统内容。例如,梅拉妮·卡梅特(Melani Cammett)在研究黎巴嫩真主党时,就曾认真地运用这一方法,目的是要建立与其组织的联系,为与其成

<sup>①</sup> 我要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拉·斯托克(Laura Stoker)坚持让学生问自己“这个现象属于何种案例”的问题。

员进行一系列访谈打下基础<sup>①</sup>。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惠廷<sup>②</sup>和雷米克<sup>③</sup>的研究,虽然在本质上并不是典型的民族志,但他们还是靠在其蹲点调查的两个地区内建立友好关系和网络的办法。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曾经使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由政府扶植的街道组织。这种组织在中国大陆称为居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台湾地区称为里长和邻长。我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分别在七个不同的城市进行,但重点在北京市。我在那里的目标是研究城市不同地区 and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邻里。我想尽量做到随机选择实地,还希望能避开每一个区建立的“模范”街道,因为在主要城市中,人们通常把当地的和国外的参观者带到这种地方去看表演。我带着我的“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介绍信——除此之外我没有特殊许可——敲开了居委会办公室的门,进行自我介绍,说明我的工作,询问能否进来谈话<sup>④</sup>。对于那些乐于接纳我的居委会,我进行了数次回访。用这种方法我最终建立了包括十个街道的实地研究组<sup>⑤</sup>。在为完成论文进行的实地考察的14个月里(1999年—2000年),以及之后进行的三次短期驻访(2003年—2007年)中,我在其中两个委员会里花了差不多30个半天(早上或傍晚),对其余大部分居委会访谈约12到15次<sup>⑥</sup>。每一次访问我都坐在办公室里与工作人员交谈,看他们怎样办公和讲些什么。

我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街道社区中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种由政府扶植的最基层组织与它们代表的居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题目非常微妙,具有复杂性和细微区别,而且因地点、人群和情境而不同。这类问题都是不公开的,他们还会尽量掩饰,因为居委会或者它的辖区不

<sup>①</sup> 截至2009年6月,人们还在审阅在这个项目中撰写的论文,仍未发表。

<sup>②</sup> Whiting, 2001.

<sup>③</sup> Remick, 2004.

<sup>④</sup> 在两个案例中,一开始的接触都是通过熟人的非正式接触,在其他两个案例中我使用了官方渠道,通过一个街道办公室联系人,还通过市政府以及我的接收单位的外事办公室获得了正式的许可。

<sup>⑤</sup> 在五个街道中我不是被居委会就是被政府官员拒绝了。在两个这样的案例中一位警察陪我到了地方公安局,并告诉我不要再回到街道去。在十个实地中,有两个在经过六次成功的访问之后,居委会被上级通知不要继续与我联系。

<sup>⑥</sup> 在三个进行考察的实地中,我建议为工作人员或其子女教授英语,接下来几个月我每周在公寓里开办语言班。

愿意开诚布公地向一个陌生人谈论这些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流也不会留下什么可以查询的记录。所以直接观察并不能克服这些挑战。只有通过建立了解和信任，礼貌地试探，以及亲历居委会各种解决问题的过程，我才能了解到国家权力运作和城市社会之间的联系<sup>①</sup>。因此上述居委会的例子验证了这样一个公式：虽然研究这些问题会遇到官方的阻碍，但是有时（虽然不是总能）可以获得准入，尤其是通过非官方渠道。

### 第三节 深入实地法如何对理论做出贡献

正如以上的讨论所揭示的，有些时候搜集有用的数据时，需要与研究对象以及其主管的机构建立信任和了解。单单这一点就已经足以说明深入实地法的基本原理。但是除此之外，至少还有四种民族志工作方法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创立是有帮助的，我们在这里提出它们也许是有建设性意义的。

首先，民族志工作能够引出新假设。对芬诺而言，他之所以选择“泡在一起和四处打探”作为实地研究的方法，一部分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定义为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他认为政治科学家所做过的全部工作几乎都忽略了民选代表对自己的选区的理解，以及他们在选区内的行为方式<sup>②</sup>。鉴于存在理论上的空白，需要有一种“完全开放式的和探索性的”方法。

“我尽力观察和探询这些成员所做的的每一件事情。我想他们所想。我随时准备发现在工作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知道这些问题。”<sup>③</sup>

芬诺是否绝对有必要用这种方法去做研究，还有待商榷。在回顾之前的研究时，虽然他说“在议会选区中进行的政治科学研究十分罕见”，但是他接下来就这个题目引用了八本书和文章，表示它们对自己是最有帮助的。<sup>④</sup>另外，我担心芬诺过于强调他的研究方法的松散的、没有特定结构的性质，会使很多本学科的研究者误认为参与观察就是一种猜测性的，不

<sup>①</sup> Benjamin L. Read,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sup>②</sup> Fenno, 1978, p. xiii.

<sup>③</sup> Fenno, 1978, p. xiv.

<sup>④</sup> Fenno, 1978, pp. xvi, n. 9.

受形式拘泥的方法，它充其量仅在研究过程的最初始、最基础阶段才有些用处。

然而，这种开放式方法令人信服地观察到事物的内部情况，并据此对政治家和选民的行为提出新假设。芬诺没有过分强调这些假设，他提出的假设包括以下内容：众议员就职伊始最关心各自选区；议员关注最多的是最有组织，最容易以团体形式接触到的选民；而选民关注的是议员的个人关注点，是否爱摆架子，他们是否有机会了解议员的想法与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sup>①</sup>。因此，他的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参与观察方法有助于产生新的理论主张。

陈鹏通过对浙江企业进行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从中得到的一些成果，也可以被理解为属于这一类型。正如他在本书中的那一章阐述的，除了其他情况外，他还发现，在这些企业中正在建立共产党的机构。陈指出，若不是通过“最底层的观察”，很容易将这个现象误解为政府将自己的组织意志强加给企业，或者是公司在逆来顺受，以便在政治上过关。与此相反，令人惊讶的是出现了第三种可能性：公司积极鼓励这种发展，是为了借助党的帮助缓解劳工中的社会紧张<sup>②</sup>。

第二，深入实地方法还可以利用从假设中得出来的定性指标，来检验假设。这种方法来源于金（King）、基欧汉（Keohane）和维巴（Verba）的《设计社会调查》<sup>③</sup>。本书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较少有争议的概念，即通过找到和评价尽可能多的“可观察到的内涵”，定性研究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检验提出的假设，在“可观察到的内涵”中，即使只有一个单独的案例，也能说明很多问题。这恰好印证了在金、基欧汉和维巴的著作问世以前一些研究者就早已在做的工作。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sup>④</sup>中对村民的叙事、仪式、屈辱和抗争的细腻描述可以被解读为一系列对“臆测”假设的检验。贫困潦倒的村民拉扎克（Razak）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拉扎克作为地方赞助和慈善机构的受益人，不论他是否出自自愿，本应该对‘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做出积极的评价，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说‘他们叫上我们去抓逃跑的水牛

<sup>①</sup> Fenno, 1978, pp. 215, 235, 240-242.

<sup>②</sup> C. Chen, 2006, 2008.

<sup>③</sup> 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pp. 28-31.

<sup>④</sup> Scott, 1985.

或者帮他们搬家,但是他们不会叫上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富人们根本瞧不起我们”<sup>①</sup>。还有一些例子能检验对当地人的看法<sup>②</sup>,比如当一台节省人工的联合收割机陷在泥地里时,人们反而幸灾乐祸<sup>③</sup>,以及在保护村民运稻工作的村庄大门上的纷争<sup>④</sup>。

我在北京的研究中使用了从街道搜集来的证据来检验几种关于选民和居委会关系的假设。一种假设涉及的是受保护人主义。在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可以把普通公民和当权者的关系当作是一种保护人—受保护人的关系,典型的交换方式是下级给予政治支持而上级提供物质产品和工作机会。但是我对居委会的探访表明,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和支持者在帮助视察街道和为居委会上传下达信息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报偿。有些时候他们仅仅在年度聚会上才能得到象征性的礼物,比如毛巾和香皂。由街道办事处严格管理的居委会基本没有能力向他们提供政府的补偿,至于工作机会就更谈不上了。然而,事实证明,积极分子与各处的志愿者的动力都来自于自豪感、成就感,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满足感。虽然与城市居民的私下访谈以及定量调查都支持这一结论,但是参与观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只有经过了日复一日的对积极分子的观察,倾听他们与居委会工作者的谈话,与愿意坦言工作的居委会成员交谈,以及对居委会掌握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是多么有限)有了第一手的了解后,我才相信了受保护人主义的假设并不是理解这种国家—社会关系的关键。

虽然当地被访人的言语、态度和行为也是一种形式的证据——本质上也是数据点——可以用于检验假设,但是这种证据也可以采用另一种形式,即因果过程观察。西赖特(Seawright)和科利尔(Collier)给这种观察下的定义是“一种深入观察或一条数据,它包含了情景、过程或机制的信息,而且在因果推断中具有不寻常的影响”<sup>⑤</sup>。从事这种观察在本质上与“过程追踪”没什么两样。在政治科学方面,在运用历史资料进行的案例研究过程中,人们对与过程相关的证据问题,举行过一些重大的方法论讨论。这里面的道理和民族志以及参与观察的道理是一致的。实际

① Scott, 1985, p. 12.

② Scott, 1985, pp. 13-22.

③ Scott, 1985, p. 163.

④ Scott, 1985, pp. 212-220.

⑤ Brady and Collier, 2004, p. 277.

上,深入实地方法可能更适用于集合因果过程的观察,因为深入实地法使研究者能主动地探索,而不是依赖于对现有资料的被动分析。

蔡晓莉<sup>①</sup>做的关于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应的影响条件的多种方法研究,为起源于参与观察方法的因果过程观察,提供了一个卓越的例子。在这项研究中,定量证据给分析工作帮了大忙,她对四省316个村庄及其村民进行了调查。根据这些数据做的回归模型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某种形式的社会机构的村庄,比如宗教协会和宗族组织,也有修建道路和学校的愿望。蔡进一步在至少9个村庄里进行了一系列集中的定性比较,清晰阐释了被称为“团体组织”的社会机构与利益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每一个村庄案例研究都包括2到20天的探访,并记录在数页纸的报告中。它们均对因果过程做了生动的描述。如在李家庄,村领导利用同族关系和社区精神来动员村民捐款铺路;而在潘家庄,族群内各派之间的长期冲突用这种方式就无法解决。

深入实地法的第四大益处是创立、修正和提炼理论概念,并使人们在这个学科领域内去不断理解、检验和分析这些理论概念。正如布兰迪(Henry E. Brady)在为政治科学中普遍使用的定性方法辩护时指出的:

概念形成、检验、以及检验的效果在几乎所有研究中都很重要,而且可能在定性研究中是最为重要的。“公民社会”、“遏制”、“民主”、“民族主义”、“实质能力”、“社团主义”、“团体思维”和“信用度”这些概念给人们提出了超乎寻常的概念性问题,它们正如“热”、“运动”和“物质”这些概念为古代人提出的问题一样。<sup>②</sup>

在中国研究领域,我们不由自主会想到欧博文(Kevin J. O'Brien)和李连江(Lianjiang Li)关于“依法抗争”的著述,它体现了为创立理论而进行的长期、近距离研究的重要性。两位作者指出,他们的作品至今仍留下一些未来探索的空间,比如说明政府何时会消极而不是积极应对要求公正的具体吁求,以及探索地区间的差异<sup>③</sup>。他们的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率先阐述了抗争性的集体行动,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他们还详细说明了这种行动背后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影响到各级政

① Tsai, 2002, 2007a.

② Brady, 2004, p. 62.

③ O'Brien and Li, 2006, p. 114.

府的。他们虽然使用了多种资料来源，但是并非所有的都是民族志方法，作者明确指出，在他们调查工作中，只是一些在少数几个村庄中做的深入调查，对指导研究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 第四节 权衡：深度与广度

如果《弱者的武器》<sup>②</sup>一书中包含多个村庄，说服力会不会更强（或更弱呢）？如果芬诺<sup>③</sup>只追踪了4位政客，但是与每个人相处数月而不是几天呢？

所有的研究都涉及到如何权衡的问题。在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研究中，研究者要根据其自身的性质，在观察和与特定的实地和信息提供者建立关系之间进行选择，决定投入多少时间。鉴于研究项目有限的时间和资源，自然就会产生深度和广度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即要么在少量实地（或者仅一个）进行深入工作，要么开发更大数量的实地，在每一个实地花较少时间。那么在一个特定项目中应该开发多少个实地呢？<sup>④</sup>

##### 一 实地层次差异

这个问题的答案一部分取决于实地层次自变量的数量以及它们之中差异的性质。斯科特说明了他为什么选择塞达卡的原因：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而且从前的研究已经做出了一些参考值，可以根据它们分析新的变化<sup>⑤</sup>。他好像没有明确地说明为什么只选择了一个村庄<sup>⑥</sup>。其不言而喻的原因好像是，为了获得“内部未经公开的资料”，必须在一个地点长期“蹲点”，并且村庄自身的差异性（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以及在不同的信息提供者之间）要比如吉打州（Kedah）和柔佛州（Johore）那种地区间

① O'Brien and Li, 2006, pp. xi - xvii, 131 - 133, 139 - 141, 以及和歌博文的私下交谈。

② Scott, 1985.

③ Fenno, 1978.

④ 玛利亚·海默（Maria Heimer, 2006）的一篇文章包含了她在做地方官员研究时选择方法的实用讨论。她走访了12个国家，在每一个国家中都使用非常紧凑集中的一套问题。更概括地说，出现在《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中的这篇文章会吸引很多此书的读者。

⑤ Scott, 1985, p. 90.

⑥ 更确切地说，这项研究不仅仅只局限于塞达卡，它还将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寻求证据，而且斯科特提起曾经到周边的村庄去短途寻访。但是他的研究仍然在单一村庄研究的框架下。

的差异性更重要。此外，为研究设计的整体框架也不适于探索不同的实地：塞达卡的住民有意要为所有地方的农民代言。

在《家庭风格》一书中，芬诺<sup>①</sup>在谈到选择18位议员代表时使用了一种随意的口气（“我没有故意要找一个可以称之为有代表性的群体，更谈不上是什么样本了”<sup>②</sup>）。但是它的确是一个样本，而且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如此选择样本是想观察不同党派、地区、种族、年龄、资历水平以及选举竞争性的成员和选区。因此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小样本策略，以便能在一系列有潜在重要性的自变量中观察到差异性。虽然样本规模小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芬诺的道理是一清二楚的。

##### 二 发展实地的前期支出

每一个实地都包含可称之为启动支出或前期支出，它指的是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费用。那么为了完成特定研究工作而获得有效信息，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基本要求，或者说是理想的要求呢？在我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居委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大部分情况下我至少需要三到四次走访才可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在刚开始的走访中，气氛会有些紧张，交谈也很拘束。要想了解一般性的问题，比如小区有多少人口，这里有多少低收入居民等，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开放式问题，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小心翼翼和空泛的。在大部分（虽然不是所有的）实地考察中，这种戒备会随着气氛的改善而逐渐消除。因此可以说我初期投入的时间使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居委会日常工作以及和居民互动。就眼前的目标而言，鉴于研究者资源所限，如果发展实地的支出和风险越大，那么他（她）能够发展的实地就越少。

##### 三 数据搜集的性质

虽然这对于民族志研究是个一般性问题，但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建立信任和培育良好关系（无论是在本情境还是在其他情境下）所需要投入的时间，要取决于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如果只要了解基本情况，类似于居委会日常搜集，并张贴在办公室墙壁上的那种信息，比如法定育龄妇女的

① Fenno, 1978.

② Fenno, 1978, p. xiv.

数量,可能只需要一次走访就可以完成,当然这还要看研究者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介绍信。而要想了解一些不怎么公开的,开放范围有限的内容,例如,受到国家严格管理的居委会选举的实际过程,则需要几次走访才行。

在“这个天平”上的另一端,如果要想根据典型的城市人类学研究模型撰写出全面的“街道研究”<sup>①</sup>,那就必须大量地减少案例数量。这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加全面而持久的努力,甚至比我最深入的实地付出更多。此外还需要有一套在同一街道内经常走动并与形形色色的居民交谈的方法。这种交流是私下进行的,与居委会没有关系。如果我的研究项目用到这些策略,也许会威胁到我事先与居委会达成的心照不宣的谅解。于是乎,我选择在街道中做市民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居委会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私下获取居民的看法)的方法,而不是在我进行参与观察的街道上进行调查。

#### 四 优化有效性

选择研究策略时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民族志方法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利用一次性访谈就获得信息是否值得。有时为了达到目的或是在一些情况下,只需见一次面就能搞清楚研究者想了解的情况。所以通过尽量减少花在每一位被访谈者身上的时间,就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被访谈者的数量,从而了解到更大的差异性,从大样本研究中受益。有很多定性研究者甚至认为,再次或第十次造访信息提供者简直就是令人费解的浪费时间。

然而研究者愿意反复回访实地自有其中一些道理:这是因为要获得信息就需要花时间培养信任和增加了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即使最配合的,愿意提供消息的信息提供者也可能在一次谈话中或多次谈话中“改变他们的故事”。众所周知,在调查研究的领域中,对问题的不同措辞,问题顺序和问题涉及的内容都会引出不同的回答。同样,被访谈者在不同的情形下谈的事情,有可能与他们的信仰和经历完全不同或自相矛盾。此外,如果让多位信息提供者同时在一个研究实地相遇,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讲的内容。如果深入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最真实的个人想法,那么就必须考虑多次会谈,以便增强有效性。

当研究工作要依赖关键信息提供者,尤其要依赖于他们对几年前甚至

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的回忆时,这样做就显得格外重要。彼得·西博尔特(Peter Seybolt)的书《把皇帝拉下马》(1996)就是一个范例。西博尔特通过与在1954年至1984年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王福成(音译)进行的一系列长谈,勾画出了一个贫困的河南村庄的政治历史。这些访谈集中于四次访问中,1987年是第一次,1994年是最后一次。除了王以外,其他一些村民也提供了信息。正如作者描述的那样,每一次访问都使西博尔特和王(及其家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从而唤起他在口述中更深层的记忆和微小的差异。这本书绝不可能仅靠作者的一次访问就一促而就。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是需要进行多次或者长期接触的,那就是当研究工作要靠观察研究对象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时,例如,观察在访问期间突然发生的事件。芬诺<sup>①</sup>的研究非常依赖这种方式。他指出,如果他的研究工作采用的是在国会山代表办公室里听他们讲45分钟话的传统办法,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他使用的方法是寸步不离研究对象,跟着他去处理选区里发生的每一件事,记录他们在活动中的真实行为和表现,以及观察他们在与各部分选区开会之后完全放松下来时的状态。

居委会办公室也是了解情况的地方,那里是政府调解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居民和更高层的政府官员经常会面的地方,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各种不同的交往关系。在有些时候和有些场合他们会更忙些,这些办公室经常会举行各种活动,其中很多是居委会成员无法预测的,因此他们无法提前安排和规划。居民和访客突然造访的原因五花八门:比如抱怨邻居吵闹;为了申请政府福利或者批文而寻求帮助;支付小额费用;协商小棚屋、空房或者空地的商业使用;要求居委会解决任何他们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不管是关于房屋维护、兼职、婚姻介绍还是任何其他事务。同时,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走访,解释最新分派给居委会的任务并检查完成情况。警察,尤其是分给一个街道的“片儿警”,在传达或了解关于抢劫犯、假释犯、惯犯或持异见者信息的时候,经常会坐在椅子上,一边饮茶抽烟,一边聊天。

第一手观察的方法使人们能看到居民和居委会成员如何处理所有的情况。而观察者的出现总会影响到被观察者的行为,因此需要对实地考察笔记做仔细地判断,客观的分析。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建立信任和相互了解

<sup>①</sup> 如 Bestor, 1989。

<sup>①</sup> Fenno, 1978。

的重要性，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通过观察他们接触中的肢体语言（比如傲慢的还是款卑的），倾听他们讲话的语气，就可以推测出各类公民和代表政府的工作人员之间权力关系的许多情况。而且，这种观察还能使人们从谈话中发现新的问题，使他们不满足于泛泛的表面的答案，去深入探索个别的、具体的案例。例如，当一位居民到办公室来要求居委会帮助解决和邻居的纠纷，我就会询问纠纷的原委，有哪些参与方，哪些政府部门或法院参与了等等类似的问题。如果在办公室外面的情境下访谈居委会成员，就完全遇不到这种情况，她也不会想到要提起那起纠纷，这样的话就了解不到调解行为的信息。

### 第五节 结论

许多事关研究者工作的政治方面的信息，从人们原始的观点到封闭的机关活动，都是对外不公开的。而且，在政治领域中的很多情况是非常微妙的，人们还无法用已确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概念给它们定性。所以理解或者理清它们事关重大，当研究者面对以上一种或所有三种情况时，也许就需要从民族志和参与观察，或称之为“深入实地法”中找出解决的办法。这些情况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存在，而它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政治封闭、非西方国家体制的国家里特别普遍。当然，这里讨论的方法并不是了解政治活动的唯一方法，仔细研究公开的文件，挖掘和分析书面材料，以及从公开数据中推导出结论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深入实地法的目的就是要获取用平常方法无法获取的信息和最有效的数据。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详细讨论这些方法的实际操作。核心问题是，研究者要花时间与研究对象建立一种比单次访谈更深厚的关系，尽可能地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和信任。通过长期的相互交往，研究者要获得的是那些掩藏在表面下的，关于“党的路线”的情况，以及那些难以捕捉或未经考虑过的答案。虽然问卷调查和非实地对话在有些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通过观察在自然生活状态下的人们的活动，就能够得到在问卷调查或者非实地对话中永远无法获取的数据。

尽管这种方法要求投入比其他方法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些代价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全身心地在一个实地蹲点长达几个月

不是这种方法的唯一形式。政治科学家也可以在多个实地之间分配时间，或者部分地使用深入实地方法来配合其他方法。

本章向人们表明（或者是一种提示），有些人认为这些方法就是一些缺乏理论根据的，冒冒失失的实证主义是完全不对的，与此相反，它们非常适用于创立理论：提出假设，用至少两种方法检验假设，并且进一步完善概念。这部书中提出的一些经典和当代的例子，不管是在中国研究领域还是在更广泛的学科之中，都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为了充分发挥这种方法的潜力，有必要在政治科学中加强学者们之间的对话，讨论如何适当地、有效率地、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方法，这也意味着要用前后一致的，有说服力的方法，向我们学科中的同事们说明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的用处，让这种方法更好地被他们理解和接受。

本章节选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定性方法组 2006 年秋季刊的通讯中。

（薛松译 段若石校）